

# 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王 祥 贾尧天

**提 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异化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通过“拜物教”三级层面批判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宗教关系。《资本论》中蕴含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即要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不断清除“拜物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无神论的理论环境;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握宗教对经济的依赖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论; 科学无神论; 启示; 异化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马克思倾注时间和精力最多,历经千辛万苦写成的一部宏编巨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从经济学角度进一步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而且也是马克思成熟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伴而生的宗教现象进行深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是马克思对经济和宗教关系认识的崭新里程碑,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日臻成熟丰富的理论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无神论思想,成

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经济学论证和表征形式。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论》中蕴含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对于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中国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运用异化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

异化理论的提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马克思在批判视域上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进一步在政治国家的二元生活(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分离)中看到了基督教精神的世俗源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已经把异化理论从政治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但在哲学方法论上,此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与宗教异化理论、政治异化理论一样,都处于

\* 本文系教育部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生成发展及其价值研究”(15YJC710061)和2017年江苏省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题研究项目“马克思社会发展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2017ZDXTXM005)的阶段性成果。

人道主义异化逻辑的支配之中，都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进行研究的，无论是对人或人的劳动的看法，《手稿》都带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异化理论日臻成熟。马克思站在“历史评价优先”的立场上，对异化概念的内涵做了最为丰富和最为深刻的揭示。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论述，认识到了异化和物化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到第二大社会形态时才出现的历史现象，以及这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所具有的历史暂时性和积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商品拜物教，从而扫清了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后的障碍——抽象物质论。

《资本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宗教化现象进行研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的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sup>[1]</sup>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紧密结合在一起，工人的剩余劳动混同在全部分劳动当中，作为剩余劳动产物的剩余价值被看作是资本家全部成本或预付资本的增加值，它一直作为不被人们所认识的外在物而具有神秘的性质。如果不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进行极为细致和量化研究的话，作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是无法从资本的外在表现中被察觉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耗费实际上被资本耗费所取代，剩余价值被掩盖在利润的范畴之中，成为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附属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sup>[2]</sup>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这种秘密存在于资本本身所

固有的不可知性和隐蔽性，而这种不可知性和隐蔽性恰恰是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需要极力掩饰和神秘化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将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关系更加科学规范地表述出来，客观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倒立的世界”，即“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劳动和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sup>[3]</sup>在这里，人的异化在生产过程中达到严重地步，人已经无法成为自己的主宰，而完全受制于外在物的奴役和支配，物役性完全占据人的全部世界，控制了人的全部生活，即人在资本控制下完全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就“像人在宗教中要受到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sup>[4]</sup>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二重化社会，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形象表达，正是这样一个二重化社会为宗教的再次盛行提供了客观基础，它将资本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对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中，工人失去的不仅仅是剩余价值，还包括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教会则将丧失精神生活的工人引向宗教愚昧和对来世的幻想中，国家政权和宗教教义再一次联手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欺骗和愚弄，宗教成为资产阶级这个新国家主人的统治手段和压迫工人阶级的新的工具。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不得不从这种工资中支付给国家和教会的东西，则是为支付那强加于他的服务而作的一种扣除；工人支出在教育上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工人在医生、律师、牧师的服务上支出，算是他倒霉……”<sup>[5]</sup>在“倒立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服务费用其实均来自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的支付，而这一切又因为借助了神秘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新的宗教形式而变得合理合法。其本质就是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摧残以宗教的外衣掩饰起来，使工人变得麻木和愚昧，从而完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统治，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宗教化的揭示和批判将这一切清晰地抛在人们面前，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为进一步论证资本

主义的历史命运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通过“拜物教”三级层面批判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宗教的社会基础，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化的表现，是一种非宗教又倾向于宗教的现象性存在。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宗教形式的变化，而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从本质上来讲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特征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商品拜物教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内容，它们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化现象，即一种社会的异化现象，一种对物的迷信和崇拜现象。“拜物教”指的是有别于宗教信仰的对物质财富的信仰和崇拜。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曾说过“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他膜拜。”<sup>[6]</sup>“拜物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在人观念上的宗教化表征。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拜物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三级层面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和普遍现象。

马克思最先对“商品拜物教”进行批判，“商品拜物教”的观念起源于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生产商品的劳动属于私人劳动，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这样私人劳动才能具有社会的性质。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所决定的，商品作为私人劳动的产品，是物化了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商品最本质的因素是价值，最本质的属性就是价值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性，这是由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所决定的。商品之所以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即来源于各种私人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劳动的事实。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样不同的使用价值就可以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劳动产品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和生产的目的。正是“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

秘密”，<sup>[7]</sup>在《资本论》之前，人们只是看到了商品交换的现象，很少有人会看清商品交换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的本质，于是人们才对商品产生神秘感和崇拜心理。因此，商品的价值就很容易被看作精神领域中的宗教，也具有宗教神秘化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欲望燃烧起来的幻想使拜物教徒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没有感觉的东西’仅只为了满足拜物教徒的怪癖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sup>[8]</sup>商品拜物教和宗教一样，都具有了人对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某种目的的渴望的意义，即必须借助于神秘主义的力量才能实现的欲望。“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揭示并加以批判的第一级层面即人与物颠倒关系的资本主义宗教化特征，为随后马克思进行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批判“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拜物教”批判引向深入，在货币和资本的更深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进行分析。货币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其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出现后，原先商品之间的物物交换就变成了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在货币形态上，商品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上的不同，货币作为平均主义者，将附加在商品上的质的方面的差别消灭了，不同的商品都可以按照一定货币量进行无质的差别的交换。货币可以用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并且可以同任何商品进行交换，于是它就成了一个社会财富的代表，商品交换的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矛盾被掩盖，这样货币事实上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极力争取和膜拜的对象，成为万能的上帝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的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sup>[9]</sup>商品交换的原则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它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为人所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人自身。“货币拜物教”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们的劳动产品都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而劳动产品成为商品首先就意味着它失去和我们劳动的内在关联，成为可

以通过比较进行交换的同质的东西。我们的劳动必须成为合理机械的、即成为被规定好的同样的劳动，任何创造性，任何个体的差异都被当作错误加以排除。这样的劳动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而确证人的存在，而是意味着把人下降为毫无差别的物来进行计算和安排。从客观方面看，人的劳动创造出一个异己的世界，尽管人们可以利用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为自己服务，但是人们不能改变这个货币世界的本质，不可能从根本上驾驭这个世界。从主观方面看，人不仅不能控制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商品世界，就连人本身也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商品，变成了不断追求更多货币财富的奴隶。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批判是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宗教化现象的揭露进一步引向第二级层面，他深刻指出“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过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起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sup>[10]</sup>

“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必然过程的反映，它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和本质关系。在资本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秘密进行分析。资本流通过程表现为货币——商品——货币（ $G—W—G'$ ）这一资本总公式，其中流通终点的货币数量（ $G'$ ）大于流通起点的货币数量（ $G$ ）。所谓资本，从流通过程来看就是能够带来更多货币的货币，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货币。流通终点的货币数量和流通起点的货币数量之差就是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所在。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探索中，剩余价值理论是其他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的基础，也是“最富拜物教性质的理论形式”。马克思认为，这一理论的创立“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sup>[11]</sup>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sup>[12]</sup>而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

了”。<sup>[13]</sup>剩余价值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总公式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之间的矛盾，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发展达到极致，即“拜物教”发展到其第三级层面“资本拜物教”，获得了“拜物教”所能达到的最高“物化状态”。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经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的发展，完全确立了其宗教化的内在特征。由此，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抽象劳动”或“异化劳动”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sup>[14]</sup>在“资本拜物教”中，一方面，随着各种特定劳动之间的实际差别完全被抽去之后，人便成了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成了“主体”；另一方面，对象在丧失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之后就也成了纯粹由主体设定的“客体”。于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的同时，主体和客体的分裂和对立就不可避免。不仅是工人，而且资本家同样面临着主体和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也只是当做人格化的、有意志的资本来发生作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和全要素在资本的感召作用下以宗教化的形式进行呈现和表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创造剩余价值，用它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能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sup>[15]</sup>

三、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宗教关系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就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出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结论，即物质生产及其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决定国家、法律和宗教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开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还原宗教的世俗基础了，但此时的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还很大，对经济和宗教关系的分析主要局限在逻辑层面的探讨，带有明显的思辨性质。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突破了逻辑思辨的方法束缚，运用唯物史观的

基本观点,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的方法,科学地说明了经济与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揭示出“世俗基础”被二重化的深刻根源和表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关系,国家形式、法的关系和宗教关系是“非原生”,或者“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关系。物质生产决定艺术生产的发展,决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关系制约着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和过程。他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sup>[16]</sup>

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宗教形式与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严格对应关系。“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sup>[17]</sup>在古代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原始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大行其道。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古代宗教逐步式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张,以“拜物教”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世界宗教蓬勃兴起,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sup>[18]</sup>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世纪的规章制度遵循着古代宗教原则而存在,绝少受到商品、货币、资本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勃兴,尤其是借贷资本和银行资本发展起来后,货币资本的统治力占据了经济生活的绝对优势,“拜物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相对应的是宗教领域内的变革也随之发生。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宗教斗争的形式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性表现。宗教领域的反封建斗争归根到底还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所引发的,其结果必然是宗教关系越来越迎合资产阶级利益,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拜物教”性质。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的行列。而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sup>[19]</sup>这场以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原有剥削制度的宗教改革,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出现了某些革命性的变化,但依然无法摆脱以资本主义新宗教——“拜物教”造成的比以往宗教关系更为严重的异化状态,更谈不上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了,其本质只不过是宗教关系形式上的变化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货币和信用关系形象地说明了经济与宗教的内在关联,即宗教内在变化由资本主义经济变化所决定,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变化的宗教表现。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sup>[20]</sup>基督新教是在天主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基础仍旧是天主教的信仰主义传统——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形式上变化了而已。正如信用关系是在

金属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一样，信用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金属货币的物质束缚，大大减少了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发行量，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的存在基础仍然是金属货币。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由信用关系所催生的经济泡沫破灭，金属货币又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信用关系又大大深化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将资本主义推向衰落的深渊。从宗教关系来看，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宗教改革中的既迎合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又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正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发展越来越趋近于宗教原点。当宗教中的理想光辉再也无法继续照耀资本主义前行之路时，宗教神秘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成为埋葬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就像早期反对封建专制的宗教改革去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力图打破资本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指明了一个未来彻底消灭宗教和阶级斗争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组织的秘密就暴露的越少。”<sup>[21]</sup>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法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探索资本主义与宗教关系、寻找宗教秘密的科学方法，也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这一认识方法，从对商品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拜物教”宗教特征的分析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进而揭示出这些矛盾自始至终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性质，深刻阐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化背后的宗教意义和历史走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四、得出的当代启示

《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完成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与宗教关系的科学认识，实现了马克思宗教观上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即用现实

的劳动和物质生产方式来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而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实异化的宗教表现。深刻把握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必须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就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sup>[22]</sup>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异化存在物，是一个不能随意否定和跨越的历史时期，也是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代价性环节。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产生了宗教的经济基础，这使得人类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物化”又使得人的异化到达空前严重的地步，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个性再次受到宗教压制，这种“物的依赖关系”又必然要被再次否定，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即通向“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突出强调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是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的盲目性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破坏“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sup>[23]</sup>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在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的异化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过渡性，即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真正消灭宗教等“异己力量”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必须不断清除“拜物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无神论的理论环境。

“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反映。马克思通过“拜物教”三级层面批判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其中“商品拜物教”是由于人们对生产过程

中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的错误认识导致的，“货币拜物教”根源于人们对于一般等价物性质的误解和盲目追捧，而“资本拜物教”则来自于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增殖特性的极致推崇和盲目崇拜，使之脱离了其自身有限的现实环境而走向无限的宗教世界。马克思对“拜物教”的三级层面批判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商品、货币、资本的世界，对笼罩在其上的宗教迷雾进行了清算。因此，我们只有深入到那些原本不易察觉的事物背后，采用辩证思维的正确方法才能排除它走向宗教神秘性的可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视商品、货币、资本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意义，既不否定又不过分夸大他们的作用，自觉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决清除各种“拜物教”的消极影响，这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在经济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根本要求。

第三，必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握宗教对经济的依赖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在现实经济关系中找到了破解资本主义社会宗教神秘性的钥匙，确立了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绝对依赖关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sup>[24]</sup>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追逐利润、加强对工人的奴役和统治服务。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宗教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今天，由于宗教产生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消除，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一直存在。我们要利用好宗教对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调动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充分肯定宗教教义和宗教道德中与社会

公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相一致的东西，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这是新时代我们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人民出版社. 1975: 56.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人民出版社. 1975: 938.
- [3]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 人民出版社. 1985: 303-304.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人民出版社. 2001: 717.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人民出版社. 1972: 209-210.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1956: 448.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92.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1956: 11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人民出版社. 1982: 156.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人民出版社. 1982: 62.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548.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人民出版社. 1982: 204.
- [13]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 人民出版社. 1985: 503.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22.
- [15]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M]. 人民出版社. 1975: 233.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人民出版社. 1972: 296.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96.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96.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789-790.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人民出版社. 1974: 669-670.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人民出版社. 1974: 57.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 人民出版社. 1985: 37.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552.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 人民出版社. 1982: 49.

作者简介: 王祥,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贾尧天,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责编: 辛之声